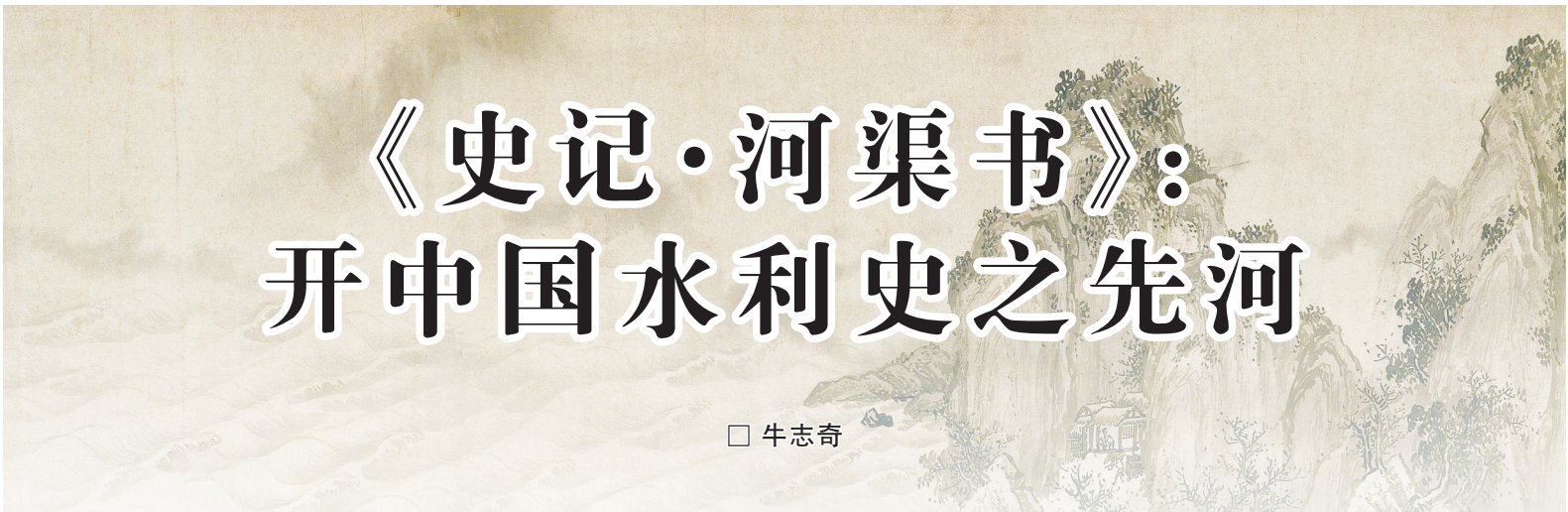




□ 牛志奇

《史记·河渠书》： 开中国水利史之先河

《河渠书》列于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主要记述从大禹治水开始，到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瓠子堵口及其后各地区倡兴水利、开渠引灌等近2000多年的水利史实，包括防洪、治河、凿渠、漕运、引水灌溉等水利建设和管理。体现了司马迁对治水历史的深切关注，对水的利与害两面性认识。《河渠书》为以后历代史书中的水利卷志编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是古代水利史志的奠基之作。

主体框架

《河渠书》按照时间顺序及内容可划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写大禹治水；第二部分写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概况，记述李冰、西门豹、郑国等人的治水功绩；第三部分写汉武帝大兴水利，引渠灌田，发展漕运；第四部分写汉武帝封禅安外，关心民瘼，亲率百官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取得成功的过程；第五部分记载了各地大兴水利和司马迁对全国水利的考察，反映了他对水利的思考与探究。《河渠书》还首创了“水利”一词，“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明确了“水利”的内涵，与现代意义的“水利”相当一致，时至今日，防洪、引水工程、灌溉依然是现代水利事业的核心内容。

《河渠书》全书共涉及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泗水、淄水、漳水、渭水、洛水等大江大河及支流共18条之多。按水利工程技术分类，计有防洪6事，灌溉13事，漕运3事，漕运兼灌溉3事。还记载了自大禹治水至西汉时期2000多年的重大治水事件，如大禹治水、李冰修建都江堰、西门豹治邺、郑国主持修建郑国渠、汉武帝瓠子堵口和各地的水利建设等，这些都是影响后世的重要历史事件，这些水利工程至今还发挥着巨大功效，惠泽千代。

主要内容

大禹治水的历史及功绩。这部分是《河渠书》开篇，首先将《尚书·夏书》对大禹治水的过程进行叙述，与现存《尚书》和先秦的其他文献中对大禹治水的记载大体一

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跂，山行即桥……”。接着论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他划分了九州疆界，随着山势疏导河川，根据土质确定贡献的等级。他开通九州的道路，修筑各湖泊的堤岸，估测山脉的走势。大禹对黄河的治理显示出运用了水利工程的方法，即，“乃脩二渠以引其河”，将黄河水道分为两条，以减小水势，其一引水北行，漳水汇入后，入巨鹿泽；再北流遂分成多条河道，分别入海。由于大禹的治理，所有的河道都经过疏通，所有湖泊的岸堤都修筑完毕，中原地区获得安宁，司马迁评价：“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称赞大禹的功绩至高无上，并惠及夏、商、周三代。

春秋战国时期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概况。司马迁在这部分列举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水利沟渠建设情况。一是通过河道沟渠的开凿进行引水、漕运、灌溉。如，引黄河水自荥阳往东南流，这就是鸿沟，鸿沟流过宋、郑、陈、蔡、曹、卫等地，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四条河流相连通。在楚地，西边有渠道连通了汉水与云梦泽，东边则有邗沟将长江与淮河相连。在吴地，有渠道连通三江、五湖。在齐地，有渠道连通淄水、济水。在蜀地，郡守李冰开凿离碓，以排除沫水暴溢之患。司马迁评价：这些渠道都可以通航，其多余之水可以用以灌溉，百姓享受到渠道带来的好处。二是记载了西门豹治邺的历史。“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指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治理漳水水患，开凿十二个渠道，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得以富足。三是记载郑国渠的修建过程。从韩国“疲秦之策”到郑国修建渠道，凿穿泾水，修一条水渠，向东注入洛水，全程300多里，用来灌溉农田，“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司马迁评价：于是关中地区沃野千里，没有荒年，秦国因而富强，最后统一了天下。

关中漕运开渠与农田灌溉。司马迁记载了关中漕运工程的修建过程以及取得的效益，一是开通联通渭水与黄河的漕运水道。汉武帝时期，任大司农的郑当时提出建议：为缩短从关东地区向长安运粮的时间，从长安凿一条渠道，引渭水傍

着南山直到黄河，汉武帝采纳了郑当时的建议，命来自齐地的水利专家徐伯进行勘察，测量地势，确定河道走向，动员数万名兵卒开凿漕渠，历时3年完工，通水后，漕运十分便利。二是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一带的土地。汉武帝接纳河东太守番息的建议，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一带被遗弃的荒地，可造田五千顷，可得粮食二百万石以上。三是开凿井渠用以灌溉。为实现引洛水来浇灌重泉县以东的一万多亩盐碱地的目的，汉武帝动用了上万名士卒去开凿河渠，从徵县引洛水到商颜山下。但所开凿的渠岸常常崩塌，只好改为挖井，有的井深的达到四十多丈，沿线依次挖井，井下水流相通，就这样水从地下流过商颜山。有水利专家认为：“井渠”技术从这里出现后传到了西域，新疆地区的“坎儿井”吸纳了“井渠”的技术。

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司马迁记载，汉武帝自元封元年登封泰山以及巡行祭祀其他山川后，皇上派汲仁、郭昌调用士卒数万去堵塞瓠子决口，汉武帝也亲自来到黄河决口处，他把白玉璧沉入河中心以祭祀河神，他让随从大臣自将军以下都去背柴草以堵黄河决口。当时东郡的百姓多以柴草为燃料，所以地面上的柴草不多，于是汉武帝便下令砍伐淇园的竹子以编制堵塞决口的竹笼。汉武帝亲眼看到了黄河决口的情景，伤悼20多年的堵口没有成功，作《瓠子歌》以纪念这次的堵口。

各地大兴水利和司马迁的水利考察。这部分记载了自“瓠子堵口”后各地重视水利的情况：各地纷纷开渠灌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诸郡都是引黄河或其他川谷的水来灌溉农田；而关中的辅渠、灵轵渠引的是当地各条河的水；汝南、九江两郡引的是淮水；东海郡引的是鉅定泽的水；泰山脚下引的是汶水。每处都有上万亩的农田得到灌溉。这段的记载说明西汉时期重视灌溉系的建设，农业灌溉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力促进西汉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河渠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叙述司马迁对全国的水利进行实地考察，登过庐山，看过大禹疏导的九江，南到过会稽郡，登过姑苏山，巡视了引淮、泗、济、漯、洛诸水的渠道，看了蜀地的岷山与离碓的

水利工程。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水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历史地位

《河渠书》为《史记》中的“八书之一”，与记载礼乐、天文、历法、经济政策等内容的“书”并列，说明水利在西汉时期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河渠书》内容丰富、叙事详细、体例完备，对后世史书中水利专志的编撰影响深远，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历代志书中，直接用“河渠书（志）”这个名字的有7部，即《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宋史·河渠志》《金史·河渠志》《元史·河渠志》《明史·河渠志》和《清史稿·河渠志》，虽然《汉书·沟洫志》用的是“沟洫志”这个名称，但其写作体例和叙述结构都沿袭了《史记·河渠书》的写法。此外，《新唐书·地理志》也按地域记录了唐代主要的水利工程。这7部水利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的水利内容，基本概括了我国长达两千多年水利发展的重要史实，而且司马迁在《河渠书》中以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水利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反映出深厚的治水思想。《河渠书》此例一开，不但正史，很多地方志、专项志书都将水利列为专章，水利成为古代史志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治水方略、水利工程技术、水利管理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河渠书》开启了中国古代水利史的先河，是中国古代水利史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所记载的水利史实和反映出的治水思想被后世所秉承和发扬。

历史文化典籍

这吟唱里更有对百姓的关切与同情。屈原希望百姓安康，他在《少司命》中歌颂“竦长剑兮拥幼艾”保护人民的女神，在《东君》中赞美“举长矢兮射天狼”为百姓除害的太阳神，在《国殇》中歌颂“魂魄毅兮为鬼雄”为国捐躯的将士。屈原虽然处境艰难，但他想到百姓就获得了力量，“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悯”。当他看到百姓流离失所时，他发出了深重的哀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他一遍遍劝诫统治者要体恤民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极极”。

这吟唱里还有对楚地山川的热烈歌咏。流放后的屈原，行走在楚国的山水之间，这些石草树木因为诗人主观情思的投射和对对象化，而获得了格外浪漫神奇的美丽。《楚辞》中呈现的楚国山水有沅、湘、澧、江、淮、洞庭、庐江、九疑等，记载的楚国地名有苍梧、溆浦、辰阳、夏浦、汉北、鄂渚、郢等，描述的楚国物产有兰、荪、荃、猿、花椒、辛夷、杜衡、薜荔、桂树等，它们目不暇接地出现在诗歌中，构成了一份丰饶而艳丽的时空背景，美不胜收。正如在《湘夫人》中，屈原描写的洞庭湖“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悠渺如画，令人神往。如果没有热爱，怎会有如此情怀。

文学中的家国情怀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及其后学者如宋玉、景差等人的诗歌集，由西汉年间的刘向辑编定。诗歌集中，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作品最为精华，而宋玉等人的作品多是模仿屈作而成，因此古往今来，人们常将《楚辞》与屈原的诗歌等同起来。

《楚辞》在我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文化史上有源头地位，它以雄伟的气势、瑰丽的想象开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更以身许国的抱负烛照着我国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楚辞》在思想文化上蕴含的家国意识比它在艺术上开创的诗歌体式影响要深远得多，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危机，后世的志士仁人常会回望《楚辞》，《楚辞》犹如一道奋进的战歌，屈原就是一面精神的旗帜。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特意赠送对方一本《楚辞集注》，毛泽东是在用《楚辞》表明中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利益的坚定决心，表明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源远流长、深入骨髓、历久弥新。《楚辞》浓郁的家国情怀蕴含在几个方面。

对父母之邦的忠诚与热爱

屈原出身于楚国王族，楚地是他的父母之邦。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屈原一往情深地热爱她，始终不渝地忠诚于她。在屈原的诗歌里，他言楚声、发楚语、写楚物、状楚风，把楚国的山川地理、人事风物蕴藉在胸中、书写在笔下。从尊贵君王到黎民百姓，从高山大江到一草一木，屈原都饱蕴感情反复吟咏。这吟唱里有对君王的忠贞。楚王是楚国最高代表，对屈原而言，不论是前期受到楚王信任而被重用，还是后期遭小人谗言而被流放，他始终愿以“忠信而死节”的姿态面对楚王，始终“忍而不能舍也”，期盼楚王“美之可光”。

这吟唱里更有对百姓的关切与同情。屈原希望百姓安康，他在《少司命》中歌颂“竦长剑兮拥幼艾”保护人民的女神，在《东君》中赞美“举长矢兮射天狼”为百姓除害的太阳神，在《国殇》中歌颂“魂魄毅兮为鬼雄”为国捐躯的将士。屈原虽然处境艰难，但他想到百姓就获得了力量，“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悯”。当他看到百姓流离失所时，他发出了深重的哀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他一遍遍劝诫统治者要体恤民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极极”。

这吟唱里还有对楚地山川的热烈歌咏。流放后的屈原，行走在楚国的山水之间，这些石草树木因为诗人主观情思的投射和对对象化，而获得了格外浪漫神奇的美丽。《楚辞》中呈现的楚国山水有沅、湘、澧、江、淮、洞庭、庐江、九疑等，记载的楚国地名有苍梧、溆浦、辰阳、夏浦、汉北、鄂渚、郢等，描述的楚国物产有兰、荪、荃、猿、花椒、辛夷、杜衡、薜荔、桂树等，它们目不暇接地出现在诗歌中，构成了一份丰饶而艳丽的时空背景，美不胜收。正如在《湘夫人》中，屈原描写的洞庭湖“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悠渺如画，令人神往。如果没有热爱，怎会有如此情怀。

对美政理想的追求与期盼

《楚辞》中的很多篇章在抒情之余，都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表达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屈原极富才识，太史公说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他熟悉华夏的历史，在《天问》中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从虞、夏直到殷商、周代的重要事迹，用疑问的口吻表现了自己对治乱兴亡、盛衰交替的深刻思考。他向往古圣先贤的事迹，多次称赞尧、舜、禹、汤、伊尹、武丁、周文王、齐桓公等，希望当今的楚王也能像他们一样图强用事，“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建立一番功业，实现美政善治。

在屈原笔下，美政有两个重要内涵，其一是举贤授能。在战国时代，举贤授能意味着打破陈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废除旧贵族特权，在民众中选拔任用贤能之士。在《离骚》中，作者慷慨陈词：“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骤兮，来，吾道夫先路！”屈原愿意做一个破旧立新的先驱者。他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三王时代之所以能够享有盛世，正是因为有众多贤能之士的共同辅佐，群贤毕集而言路广阔。因此，屈原在作品中反复劝诫楚王要广纳贤士。

美政的内涵之二是申明法度。受到楚王信任时，屈原从事的一项重要事务



虽九死其犹未悔

便是为楚国起草宪令，通过严明的法制来规范国家事体，尤其是制约宗亲贵族的罔顾法度、特殊利益，以把楚国引向富强。被疏放逐之后，屈原在诗歌中一再叹咏，希望楚王远离奸佞宵小，学习古代贤王，不要像启、羿、桀、纣等昏君一般善恶不分、丧身辱国。他语重心长地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既是说天道公正无私，谁能实行德政，才会护佑他管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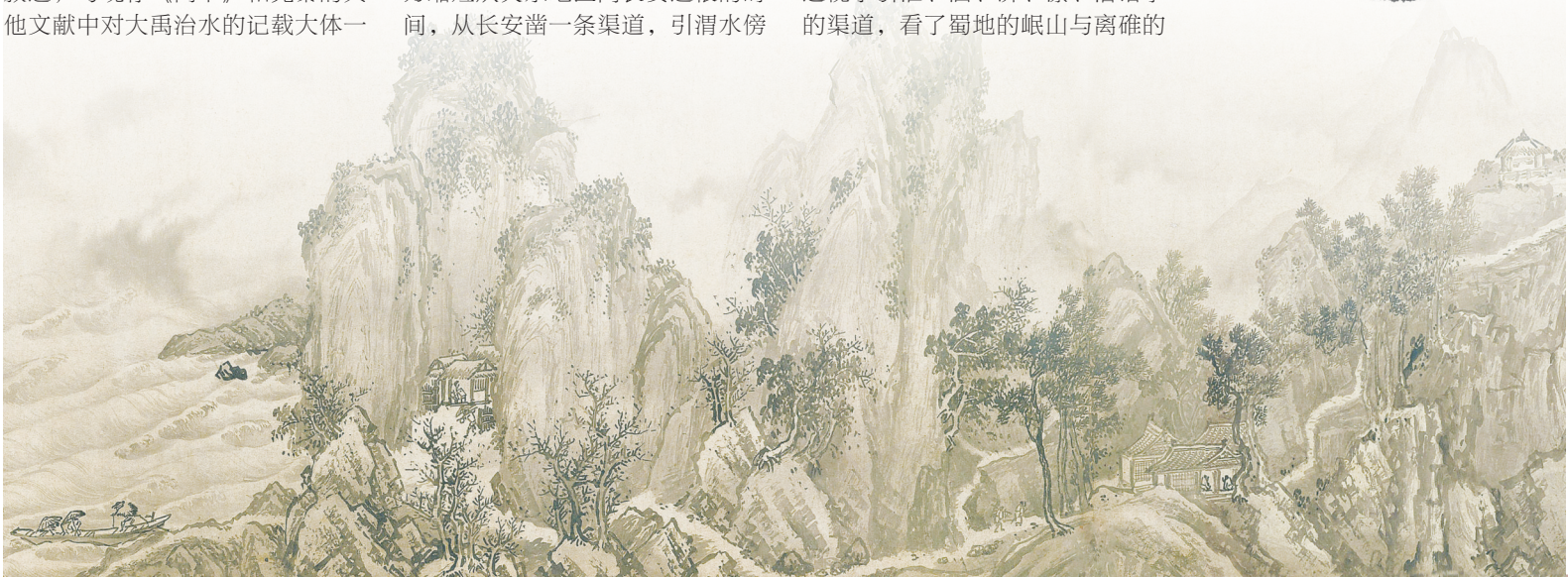
对这样的美政理想，屈原矢志不移。尽管他遭到贵族集团的排挤而远离了朝堂，尽管他“穷困”“郁邑”“流亡”，但他绝不与群小同流合污，绝不背绳墨而迫曲，他踽踽独行、义无反顾，抱定了“伏清白以死直兮”的决心，立定了“虽体解吾犹未变”的志向，慨然向世人宣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一种怎样执着、坚定而无畏的精神。

对家国命运的忧思与愤懑

屈原生活的年代，是战国后期各诸侯国竞争最为激烈的时代，诚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的局面由小而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普遍地生出了更严密的统一要求，即所谓‘大一统’。由殷周以来的多数氏族集团归并而为春秋的十二诸侯，再归并而为战国的七雄，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正明显的表示着这个‘大一统’的趋势。”屈原当然也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他希望这个大一统是由楚国来完成的。从当时的形式来看，战国七雄中燕国偏于北方，国力较弱，韩、赵、魏三国经过秦军打击也一蹶不振，只有西部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势力最强，最有希望实现统一。而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后实力大增，对楚国来说，与齐国联合抗秦就成为正确的战略选择。这也是屈原认定的方向。但是，秦国却从中作梗，极力破坏齐楚联合，他们收买了楚国的旧贵族，向楚王大进谗言。楚王终为谗言所惑，流放了屈原。对于这一战略方向的变化，屈原无比痛心，他在诗歌中对楚王的昏聩进行了谴责，“伤灵修（指楚王）之数化”，“弗参验以考实兮，迁廷臣而弗思”，对只顾私利的群小进行了讽刺揭露，“众皆竞进以贪婪兮”“惟夫党人之乐荣兮”。

昏君佞臣最终铸成大错，招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郢，楚面临着亡国之危。屈原痛心而绝望，他写下了《哀郢》《怀沙》《抽思》等作品，抒发国破的悲怆。故都再也回不去了，他魂牵梦绕，“惟路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离骚》的后半部分，屈原想象着离开楚国去四处漫游，他从“天津”到“西极”，从“流沙”到“赤水”，然而来到家乡的上空瞥见了故国家园时，连马儿也继续着不肯再向前走了。

公元前278年，也就是郢都破灭之年，62岁的屈原耗尽了最后心血，在汨罗江自沉身亡，用生命谱写了最后一曲绝唱。这一绝唱，响彻千年。唐代诗人李白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楚王的楼台早已消失殆尽，然而赤诚的爱国者屈原，却在后人的传唱中获得了永生！



（上接1版）特别是中国在全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是加强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研究，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围绕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

第四，放大的指导地位功能。作为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功能是不可否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能够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分清楚。政治经济学需要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体地说分清公有和非公有，特别是明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功能使然。但分清公有和非公有的目的是服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各自的领域各展所长，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提供思想教育教材，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需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功能不仅仅在于此。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有两个重要指导地位功能不能忽视而且要进一步加

强。一是提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所提供的经济学理论不但不能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更要敢于面对现实，对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经济现象作出理论的解释。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和宏观的运行提供基本的理论和经济学原理。二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国家的经济决策、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讲好中国的故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建设性意见。如果不能提供理论指导，让其他学科来提供理论指导，政治经济学就会丧失主流经济学地位。政治经济学要发挥主流作用，就要成为一个经世致

用的学科。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不仅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经济发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